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

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 下册

Deriv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Document
Centred around Circulation and Block Printing in Late Antiquity
VOLUME II

顾永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

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 下册

Deriv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Document
Centred around Circulation and Block Printing in Late Antiquity
VOLUME II

顾永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第三章 其他系统或载体的经学文献·····	549
第一节 元代坊刻与学术的互动关系研究	
——以刘叔简日新堂为中心·····	549
第二节 《诗义》修撰及其解经体式考论·····	571
第三节 龚原、耿南仲《周易新讲义》名实考略·····	591
第四节 《吕氏家塾读诗记》版本考略·····	600
第五节 经学文献的散佚或缺或张冠李戴·····	625
上、二苏“五经论”归属考·····	625
下、苏辙佚文两篇疏证·····	639
第六节 经学文献的特殊载体——石经研究·····	650
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刊石、雕版考略·····	650
中、蜀石经续刻、补刻考·····	668
下、嘉祐石经丛考·····	687
第四章 日本佚存经学文献的回传·····	703
第一节 日本传本《古文孝经孔传》回传中国考·····	703
第二节 日本传本《孝经郑注》回传中国考·····	730
第三节 《孝经》开元始注与天宝重注比较研究·····	746
第四节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考述·····	772
第五节 佚存经学文献举隅	
——《周易本义附录集注》考略·····	788
结 语·····	798
参考文献·····	802

2 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下册)

主题词索引·····	817
图版目次·····	832
后 记·····	845

第三章 其他系统或载体的经学文献

第一节 元代坊刻与学术的互动关系研究

——以刘叔简日新堂为中心

一、儒学盛行与坊刻兴起的关系

福建建宁地区的雕版印刷业是从宋代发展起来的,经元、明二代,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与当地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和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南宋以后,政治中心南移,加速了毗邻浙江的建宁刻书业的发展。建宁府在宋、元、明三代下辖建安(今建瓯市)、建阳(今建阳市)、崇安(今武夷山市)等县,府治在建安。建宁地区地处闽北洼地,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水陆交通,宋元以降成为雕版印刷的重要基地和书籍流通的集散地。武夷山区盛产竹木,当地人以嫩竹造成竹纸,用楮树皮造楮纸,方便价廉。楮树木质软硬适当,适于制成雕板,快速刻印^①。宋叶梦得即曰:“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②

南宋建阳麻沙镇、崇化坊(今书坊乡)是书坊集中之地,号为图书之府^③。朱熹指出“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上自‘六经’,下及

① 一般认为,建本雕版所用木材是榕木。不过,也有不同说法。据郑衡泌《麻沙书坊——中国古代刻书中心》(《福建地理》1996年第二期),榕树是典型的亚热带和热带树木,多生长于闽东南地区,麻沙周围未见榕树,也不见有关榕树的记载(石建平《福建竹纸和福建刻书业》,见《福建史志》1988年第五期)。因此,麻沙刻书用榕木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提出,麻沙刻书所用木材多为当地生长的梨木、樟树、楠木,坚实柔韧,是制版刻书的好木材。

② 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八,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页。

③ 宋祝穆《方輿胜览》卷一一《建宁府·土产·书籍行四方》,四库本,第471册,第652页下。原文作“富沙、崇化两坊”。“富沙”是建宁府建安的别称,建安古有富沙驿。此处当作“麻沙”。

及训传”^①。刘克庄盛称“两坊坟籍大备,比屋弦诵”^②。元代建阳坊刻也十分发达,据前人考证,知名的书坊就有三十馀家,出版量大,影响也很大。宋元时期建本书籍行销全国各地及新罗、日本等国家。元熊禾《书坊同文书院上梁文》有曰:“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儿郎伟,抛梁北,万里车书通上国。”^③坊刻的崛起也带动了流通渠道的畅通,当地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书市。《(嘉靖)建阳县志》卷三《封域志》“乡市”条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明初,由于朝廷鼓励刻书业,一些元代已负盛名的建阳老店,如刘氏翠岩精舍、日新堂、叶氏广勤堂等皆继张书肆,持续发展。建阳坊刻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

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优良的雕版印刷传统是建阳坊刻兴起的诸多因素中的必要条件,良好的学术文化环境,尤其是儒学的盛行,则直接促成了建阳坊刻的兴盛与繁荣。唐末、五代直至宋、元的几百年间,建宁地区未经战火,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其他地区的频仍战乱使一些文人学者避居此地,或著书立说,或讲学授徒,逐渐形成了当地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宋代福建理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宋杨时、游酢“程门立雪”之后,不负“吾道南矣”之厚望,把二程理学传到福建,是为八闽理学之开山;南宋有刘勉之、罗从彦、李侗等发扬光大;朱熹则视为二程经杨、罗、李的四传弟子,集理学之大成,创立了朱子学,其影响遍及整个江南,尤以福建朱子学派最为强大,著名的有黄榦、蔡元定、蔡沈、陈淳、真德秀等,他们在理论上对朱子理学又有阐发,进一步推动了朱子学的发展。元代朱子学播及全国,福建也有熊禾、陈普、郑仪孙、吴海等学者,忠实于朱子学说,潜心于“四书”“五经”研究,对朱子学的发展也有贡献。总之,宋元时期福建为全国重要的理学传习、研究中心。尤其是以建阳为中心的闽北地区,理学学者和学派多集中于此,建阳被誉为“南闽阙里”。

与理学的发展相适应,宋代建阳书院众多,仅朱熹讲学、主持、倡导建立的就有几十所,^④著名的如考亭书院、云谷书院、寒泉精舍、同文书院等。朱

① 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八《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

② 元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外集》卷一四《建阳县厅续题名记》,四库本,第929册,第288页下。又见于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九,篇名无“记”字,《四部丛刊》景旧钞本。

③ 元熊禾《勿轩集》卷四,四库本,第1188册,第804页下,又见于《(嘉靖)建阳县志》卷五《学校志》。

④ 据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统计,与朱熹有关的书院达67所,有创建、修复、读书讲学、题写诗词等情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熹曾长期居住在建阳考亭,他与弟子在闽北地区创办的众多书院,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并一直延续到元、明二代。书院的发展,极大地扩充了读者群体,有力地拉动了书籍的刊刻和销售;知识阶层的广泛参与,又使刻书业获得了必要的智力支持和充足的稿源。可以说,宋元时期福建书院的发达对于刻书业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有些书院也刻书,“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①使刻书活动和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水乳交融。如同文书院即有书坊坐落其中,朱熹亦曾刻书售卖。张栻对此颇有微词,建议他别向他求,可朱熹却认为“别营生计,顾恐益猥下耳”^②。在朱子看来,刻书销售并没有妨碍其圣贤事业。熊禾所谓“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犹水行地”,^③似乎已经揭示了理学与坊刻的内在联系。

以理学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和以书坊为主体的商业出版两相互动,在文化传播这一大舞台上交相辉映,相辅相成。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文化思潮的走向影响甚至左右着商业出版的取向和进度,而雕版印刷的最终商品——书籍又为学术进步和文化遗产推波助澜。伴随着理学传入福建,发扬光大,直至朱子学派的创立和发展,建阳坊刻一直是与之相始终、同步发展的。二者紧密结合的直接成果就是经史文献、理学著作的大量刊刻。由理学家所倡导的读书讲学之风往往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借助于诠释儒家经典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或推阐旧注,或自出新意,或集解众说,或拾遗纠谬。叶德辉《元私本考》就《四库全书》经部所录百馀部元版书进行考录,其中四分之一强属于坊刻,不乏名家名著。尽管书坊以牟利为先,但也有书坊主出于弘扬学术的考虑,或者是为了树立书坊的形象,提高知名度,对于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隆重推介,刊刻行世。当然,出于商业目的,书坊主在选题上更加关注的势必是经济效益。有时也把同一著作改头换面重新刊行,或把某些名家名著多次再版,甚至伪造、假托、剽窃学术著作。清顾广圻《重刻〈古今说海〉序》曾指出:“南宋时,建阳各坊,刻书最多,惟每刻一书,必请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以炫价,而古书多失其真。”^④元

①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监本二十一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道光十四年黄氏西谿草庐刻黄汝成《集释》本,1985年,第1375页。

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六《与林择之书》。

③ 元熊禾《勿轩集》卷四《建阳书坊同文书院》,四库本,第1188册,第800页下。

④ 清顾广圻《思适斋集》卷一〇,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本,1993年,第529页。

仁宗延祐中复科举,其后坊刻科举程式和科举讲章多如牛毛,往往就有这种情况。肆意割裂原书、东拼西凑、改头换面的做法,影响了学术著作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当然也有集成兼总、博采众长、便于读者阅读的作用。

建阳书坊多世代经营的刻书世家,“除余氏以外,熊、魏、叶、蔡、刘、黄等几大姓,不是本人是闽学学者,就是同族,或后代”^①。他们往往是学者或藏书家与书坊主集于一身,既亲自编写或组织文人编纂图书,又直接从事图书出版、流通,具有文人、商人二位一体的特殊身份。书坊主多与文人学士有着密切交往,能够及时了解读者群体的普遍需求,捕捉学术研究的动态,探明学术著作的分布。如有佳作,他们就会收购书稿,或联系作者,不失时机地尽快出版。有时,还会主动地去组织稿源,根据选题邀请文人写作,以使书坊出版的书籍具有延续性和时效性,当然也有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的初衷。书坊把图书编纂、刻印、销售集于一体,掌握了图书产销的整个过程,其中也包括与刻书所需原料产地的联系和图书流通环节的渠道,成为一个文化与商业有机结合的出版机构。有文化的书坊主在学术领域的介入或直接参与在某种程度上说并非坏事,他们真正地了解学术界,了解学者学术研究的成果及其对学术著作的需求,加之这种编辑、出版、发行三位一体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之有利于及时推出新的学术著作,刊印快,行销广,市场占有率扩大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受众面及其在学界影响的扩大。同时,书坊也考虑到大多数读者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书籍编纂体例和版式行款上下工夫,或以“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等形式编书,方便读者诵读和查阅;或使用黑口与书耳,眉目清晰,易于翻检。书坊在学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守要的桥梁,对于满足图书市场需求、弘扬学术、传承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刘叔简日新堂刻书考略

刘氏日新堂是元代建阳名肆,主人刘锦文,字叔简,现存的刘氏宗谱未见其名,生平不详。《(嘉靖)建阳县志》卷一二称其“博学能文,教人不倦,多所著述。凡书板磨灭,校正补刊。尤善于《诗》,有《答策秘诀》行世”。他就是文人兼书坊主二位一体的典型代表。日新堂所刻书以经部、集部为多,

① 林拓《福建刻书业与区域文化格局关系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四期,第51—57页。

书稿质量和刊印质量都比较高^①。

刘叔简日新堂刻书多在元代后期,主要是元顺帝至元、至正年间,直至明代中叶,前后延续二百多年,刻书甚夥。日新堂刻书多有牌记如“某年日新(书)堂刊行”“建安刘叔简刊于日新堂”或“某年日新书堂刻梓”等^②。刻书的地点在建阳崇化书林,其称建安,当以建宁府治在建安或沿用古建安郡名。现就经眼版本及相关著录,将刘叔简日新堂刻书情况列简表如下:

作者时代、姓名	书名、卷帙	刊刻时间	牌记	版式、行款	收藏及著录情况
元阙名撰	《新编事文类要启劄青钱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十一卷	泰定元年(1324)	泰定甲子孟秋日新书堂重刊	十五行二十四字,黑口,左右双边。	昭和三十一年(1963)东京古典研究会用德山藩毛利氏藏泰定元年建安刘氏日新堂重刊本影印
宋陈彭年等	《广韵》五卷	元统三年(1335)	元统乙亥中秋日新书堂刻梓	十三行,黑口,左右双边。	日本米泽图书馆兴让馆
元俞皋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	后至元四年(1338)	至元后戊寅日新堂刊行	十行二十字,注双行二十七字,黑口,四周双边。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① 后至元四年(1338)刻《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是书解题云:“雕镂精雅,钱氏《敏求记》称为元槧之至佳者(清钱曾说见《读书敏求记》卷一上是书解题,清管庭芬、章钰校证本,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本,1990年,第38页。“佳”上无“至”字),信然。”(原注:“俞氏(皋)所据经传文皆宋槧佳本,往往与唐石经合。”)《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九册,第79页)再如国图藏后至元六年(1340)所刻《伯生诗续编》,王国维先生跋曰:“此刻虽出坊肆,而字画清劲,可与蒋易《国朝风雅》相伯仲,在元季刊本中实为上驷。”又如至正十二年(1352)刻《诗传通释》“经文无讹字,反切不改直音,朱子说无删削,多与宋刊《集传》同,足以正俗本之讹”(清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卷二,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本,1990年,第222页)。又如至正十六年刻《韵府群玉》,清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一〇元版子部称其“刊手精整,摹印匀净”,“至正中刊版,犹(阴)时夫原书”(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影印光绪中王先谦校刻本,第485页)。

②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元时书坊刻书之盛》将刘氏日新堂与日新书堂分立,列为两家(中华书局,1987年,第103—106页)。非是。

(续表)

作者时代、姓名	书名、卷帙	刊刻时间	牌记	版式、行款	收藏及著录情况
元虞集、 元虞集、 吴全节 等	《伯生诗续编》 三卷、 《题叶氏四爱堂 诗》一卷	后至元六年(1340)	卷首目录后 “至元后庚辰 刘氏日新堂” 识语四行	十行十五字, 黑口,左右 双边。	国图
元揭傒 斯	《揭曼硕诗集》 三卷	后至元六年	至元庚辰季 春日新堂印 行	十行十九字, 黑口,四周 双边。	国图藏傅增湘抄补 缺叶并跋本
宋朱熹 考异、 宋王伯 大音释	《朱文公校昌黎先 生文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遗 文》一卷、《传》 一卷	后至元七年 (1341)①	至元辛巳日 新书堂重刊	黑口,十三行 二十三字,注 双行同。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原昌平坂学问所旧 藏)、山东省图书馆 (据《中国古籍善本 书目》)
元黄瑞 节辑	《朱子成书》十卷	至正元年 (1341)	至正元年辛 巳日新书堂 刊行	十一行二十 字,小字双行 同,黑口,四 周双边。	国图、台北故宫博 物院
元倪士 毅	《四书辑释》三十 六卷	二年	至正壬午夏 五日新书堂 刊行	十三行二十 一字至二十 四字不等,黑 口,四周双 边。	蓬莱慕湘藏书楼、天 津图书馆、日本斯道 文库、宫内厅书陵部 日本文化九年 (1812)覆刻本

①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和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干支均为辛巳。刘叔简日新堂元代刻书可考者大体在泰定元年(1324)至至正十七年(1357)之间。如果其刻书始自世祖至元十八年,那么到至正十七年已有76年,可能性极小。所以,我们认为辛巳当为元顺帝至正元年,改元之前,故称(后)至元辛巳(七年)。《书林清话·元时书坊刻书之盛》(第106页)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二三集部唐五代别集类No.13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均著录为至元十八年,疑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著录为至元七年,甚是。

(续 表)

作者时代、姓名	书名、卷帙	刊刻时间	牌记	版式、行款	收藏及著录情况
元赵沅	《春秋金锁匙》一卷	三年	至正癸未日新堂刊 ^①	十行二十三字。	元本未见。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抄本及清乾隆中孔继涵《微波榭丛书》覆日新堂刊本。
元谢升孙 ^②	《诗义断法》五卷	六年	建安日新堂新刊谢氏诗断至正丙戌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诗》类存目一著录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未见。
元朱礼	《汉唐事笺对策机要前集》十二卷、《后集》八卷	六年	至正丙戌日新堂刊	十一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国图
元朱倬、元赵德	《诗经疑问》七卷、《诗辨说》一卷	七年	卷首“至正丁亥蒲节建安书林刘锦文叔简”序及《诗经疑问纲目》 《纲目》尾题前有“至正丁亥菖节刊”牌记	十一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边。	国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元王充耘	《书义主意》六卷	八年	卷首“至正戊子七月既望建安书林刘锦文叔简谨识”序 序后有“日新堂”及“刘氏叔简”印记	十四行二十三字,细黑口,左右双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末毛氏汲古阁景写至正八年刘氏日新堂本 清代有《粤雅堂丛书》本
元张泰著 刘锦文编选	《群英书义》二卷				

①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明抄本及《微波榭丛书》覆刊本卷端题签均作“癸未”。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著录影元刊本作“癸丑”(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本,1990年,第435页),误。至正中无“癸丑”。叶德辉《元时书坊刻书之盛》据此以至正癸丑为明洪武六年,注曰:“已入明洪武六年,盖犹奉元正朔。”(第104页)盖臆说也。

② 清永瑔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经部十七《诗》类存目一是书提要据《经义考》的著录推断作者为谢叔孙(中华书局影印清浙江杭州刻本,1965年,第138页)。实际上,《经义考》卷一〇八《诗》十一署是书作者为谢升孙(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林庆彰等编著《点校补正》本,1997年,第四册,第83—84页),《四库提要》误引“升”作“叔”。详参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宋元经义类经学文献研究”。

(续表)

作者时代、姓名	书名、卷帙	刊刻时间	牌记	版式、行款	收藏及著录情况
元汪克宽	《春秋胡氏传附录纂疏》三十卷	八年	建安刘叔简刊于日新堂	十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	国图、台北“中央图书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元赵天麟 元刘锦文	《太平金镜策》八卷附《答策秘诀》一卷 ^①	九年	至正己丑建安日新堂誌 ^②	十三行二十五字,黑口,左右双边。	国图藏残本四卷,存卷三至卷六,无《答策秘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册据国图、旅顺博物馆藏本影印卷三至卷八。
元刘瑾	《诗传通释》二十卷、《纲领》一卷、《外纲领》一卷	十二年	卷一末有“至正壬辰仲春日新书堂刻梓”木记 卷首《诗传纲领》首叶次行有“建安刘氏日新堂校刊”九字木记	十二行二十一字或二十三字,小字双行二十三字,黑口,四周双边。	国图藏本卷一六配清抄本
元邹季友	《书集传音释》六卷	十四年	卷首《说书纲领》后有牌记“至正甲午孟春日新书堂谨记” 《书序》后又有牌记“至正甲午孟春日新书堂新刊”	十一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国图藏《书集传音释》六卷六册(卷四至六配明复斋刊本) 上海图书馆藏残本(存卷二、三、五及卷六前八叶)
元许谦	《诗集传音释》十卷	十四年			今无传本。据前揭《书集传音释》卷首《说书纲领》后牌记知日新堂曾刊行是书。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七集部五十诗文评类存目《答策秘诀》提要云:“旧本首题建安刘锦文叔简辑,末有跋语,题‘至正己丑建安日新堂志’。跋中又称不知作于何人,相传以为贡士曾坚子白之作云云,则又非锦文所辑矣。……盖犹南宋人书也。”(第1798页)

② 转引自《书林清话·元时书坊刻书之盛》(第104页)。

(续 表)

作者时代、姓名	书名、卷帙	刊刻时间	牌记	版式、行款	贮藏及著录情况
宋毛晃增注、毛居正重增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	十五年	至正乙未仲夏日新书堂重刊	十一行大小字不等,黑口左右双边。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国立公文书馆 国图藏残本、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明修本
元阴时夫编、阴中夫注	《新增说文韵府群玉》二十卷	十六年	至正丙申暮春刘氏日新堂谨白	行大字约十六七,小字约二十七八。	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
宋孙奕	《明本排字九经直音》二卷 ^①	十七年	至正丁酉日新书堂绣梓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清代有四库本及光绪中《十万卷楼丛书》覆刊本
金元好问编、元郝天挺注	《唐诗鼓吹》十卷	至正中	日新堂刊 ^②	十三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上海图书馆 国图藏残本(存卷一至卷五)

以下三种相关著录不明,且未见传本,暂付阙如,存疑待考:

1. 宋元人所编《诗学大成》有两种,一是宋毛直方《(新编)增广事联诗学大成》三十卷,有元至顺三年建安广勤书堂刊本(台北“中央图书馆”有藏)(图 3-1-1)、至正二年日新书院刊本(目录后有牌记曰“至正壬午仲春日新书院重刊”),傅增湘先生“丁巳岁(1917)德友堂阅”(见于《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〇子部四著录,今不知所在)、至正十四年鄞江书院刊本(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有藏)(图 3-1-2)。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八《〈诗学大成〉跋》曰:“直方,字静可,福建建安县人。咸淳中乡荐,入元不仕,授徒讲

① 清陆心源《仪顾堂集》卷六《重刊〈明本排字九经直音〉序》,考证其书为宋人孙奕字季昭所著(光绪二十四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560册,第434—435页)。《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经部三十三五经总义类是书提要亦以为宋人所作(第272页)。宋孙奕撰《九经直音》十五卷,元代书坊因其书合併卷数刊之,而失载奕名。元刊本除日新书本(公文书馆藏本即《经籍访古志》卷二著录本),尚有梅隐书堂本(即《四库提要》所著录之《明本排字九经直音》二卷底本)、熊氏博雅堂本等。

② 国图藏本卷首目录后有“日新堂刊”牌记。据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第二章第一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上海图书馆藏本有“京兆日新堂刻”六字牌记。上图藏本未见,暂付阙疑。



图 3-1-2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元至正十四年鄞江书院刊本
《新编增广事联诗学大成》



图 3-1-1 台北“中央图书馆”
藏元至顺三年建安广勤书堂刊本
《增广事联诗学大成》

学,士争趋之,著有《诗宗群玉府》三十卷、《聊复斋稿》二十卷、《冶灵稿》四卷。见《八闽通志》。”一是元林楨在毛氏原著基础上增广而成的《联新事备诗学大成》三十卷,有元皇庆中建安双桂书堂刊本(台北故宫博物院有藏)(图 3-1-3)、元至正九年建宁路书市刘衡甫刊本(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有藏)、至正十四年翠岩精舍刊本(日本室町时代有覆刊本)。赵坤娟、潘国允《蒙元版刻综录》著录刘氏日新堂至正二年刻本,恐将“日新书院”误作“日新书堂”。因未见其他相关著录,姑且存疑。

2. 《新编方輿胜览》七十卷。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六著录自藏宋刻本两种,一为十四行二十五字,每卷标题“新编四六必用方輿胜览”;一为十四行二十三字,标题去其“四六必用”四字。杨氏还认为“此书元、明以下均未重镌”。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史部三亦著录这两个系统的本子,以为宋刻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亦有收藏,均著录为宋刻本。江标《宋元本行格表》卷下著录十四行本,注曰:“平津馆有廿八字本。《楹书隅录》作行二十三字,《留真谱》同。”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张元济《宝礼堂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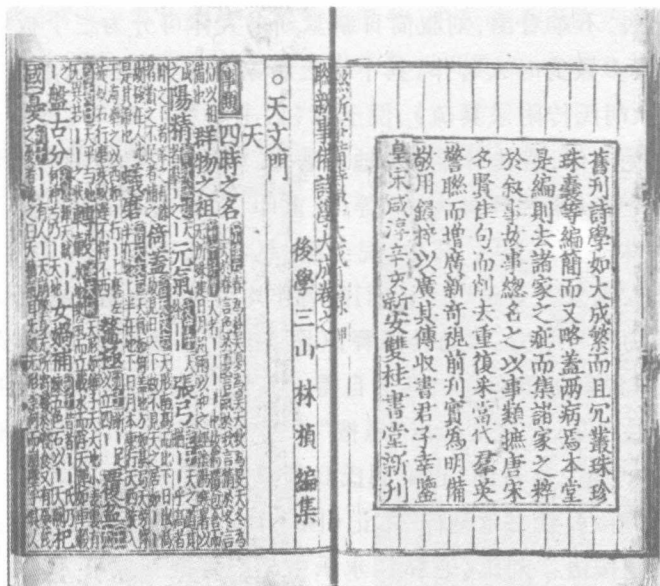


图 3-1-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皇庆中建安双桂书堂刊本

《联新事备诗学大成》

本书目》史部均著录前者为宋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著录前者为咸淳三年吴坚、刘震孙刻本。而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三著录宝素堂旧藏元刻本，首有嘉熙己亥新安吕午序及目录，署建安祝穆和父编。行款为十四行二十五字，与杨氏著录之后者同，实为宋刻本。又曰：“某氏又藏元槧本，与此板式自别，卷端页头题‘日新堂新刊’六字。”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元时书坊刻书之盛》亦以为刘氏日新堂曾刊行此书。《文禄堂访书记》著录前者的同时，又曰：“又元刻本，卷首有‘日新堂新刊’五字木记。”因缺少日新堂刊本的直接资料，暂且阙疑。

3.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邹次陈《科场备用书义断法》六卷、倪士毅《作义要诀》一卷，元刻本。十一行二十字，小字单行字数同。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其书之为元刻本殆无疑议，但哪家书坊所刻则不可考。我们通过对比倪士毅和刘叔简的交往，以及《作义要诀》附刻诸书的考证，并与《书义主意》《群英书义》日新堂合刻本比对，认为《书义断法》与《作义要诀》合刻本亦出自日新堂，当与《书义主意》《群英书义》合刻本大体刊于同时，在至正八年前后^①。

^① 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宋元经义类经学文献研究”下“《作义要诀》文本研究”。

分析上表,不难看出,刘叔简日新堂刻书大体可分为三个板块:一是经学著作,绝大多数为时人著作,其中不乏名家名作,如赵沆《春秋金锁匙》、汪克宽《春秋胡氏传附录纂疏》、倪士毅《四书辑释》、刘瑾《诗传通释》等;也有其人不见经传,然其书颇有见地的著作,如朱倬《诗经疑问》及赵德《诗辨说》、俞皋《春秋集传释义大成》等;或重印、重编前人著作,如《明本排字九经直音》《朱子成书》^①。其中,倪士毅、赵沆、汪克宽三人均为元末著名理学家,时称“新安三有道”^②。他们的著作均由日新堂刊行,足见刘叔简在学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诗传通释》(图3-1-4)作者刘瑾,江西安福人,肆力治《诗》,其说宗朱子而间出其所自得。其书以朱子《集传》为主,而博引诸家之说分注于下,己说则标以“愚按”二字。卷首《诗传纲领》署“后学安成(古邑名)刘瑾”,次行题“建安刘氏日新堂校刊”九字。本文卷一末又有“至正壬辰仲春/日新书堂刻梓”木记(图3-1-5)。《经义考》卷一一一《诗》十四是书解题按语:“刘氏《通释》,永乐中胡广等攘其成书为《大全》,惟于原书‘愚按’二字更作‘安成刘氏’而已。”《天禄琳琅书目》卷五是书提要认同朱彝尊说,曰:“今以《大全》较之,辑注微有增损,小序则《通释》附于每篇之后,《大全》冠于全书之首,并加以图二十有三,为稍异耳。”事实上,顾炎武早已指出这个问题,《日知录》卷一八《四书五经大全》条有曰:

自永乐中命儒臣纂修《四书大全》,颁之学官,而诸书(指宋元人所撰的“四书”类著作)皆废。倪氏(士毅)《(四书)辑释》今见于刘用章(原注:剡。)所刻《四书通义》中。永乐中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至《春秋大全》则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原注:字德辅,隐居不仕,以十年之功为此书。)但改其中“愚按”二字为“汪氏曰”,及添庐陵李氏等一二条而已。《诗经大全》则全袭元人刘瑾《诗传通释》,(原注:此书与《胡传纂疏》予今并有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为“安

① 清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卷一一子部儒家类“补元”著录元黄瑞节《朱子成书》十卷,解题目曰:“字观乐,以荐授泰和州学正,不赴。辑朱子《太极图》《通书》《正蒙》《西铭》诸解及《易启蒙》《家礼》《律吕新书》《皇极经世》《阴符经》《参同契》注,而以己所见为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20页)

②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七〇《沧州诸儒学案下·定字门人》,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册,第2359页。

成刘氏曰”^①。其三经后人皆不见旧书，亦未必不因前人也。^②……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后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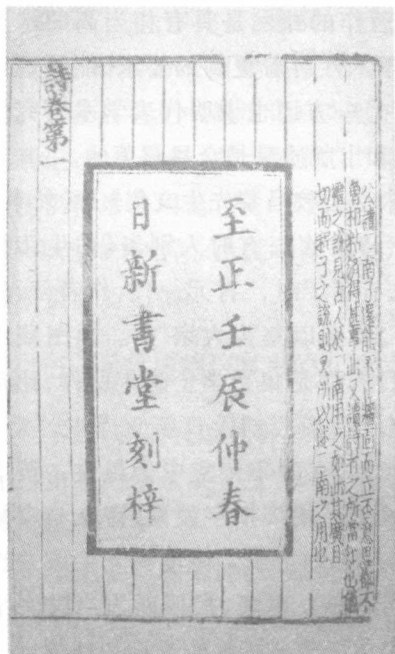


图 3-1-5 国图藏元至正十二年建安刘氏日新书堂刊本《诗集传通释》卷一尾题前牌记



图 3-1-4 国图藏元至正十二年建安刘氏日新书堂刊本《诗集传通释》卷端

这里，顾炎武提到了明永乐中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中的《春秋大全》《诗经大全》分别因袭倪士毅《四书辑释》、汪克宽《春秋胡氏传附录纂疏》、刘瑾《诗传通释》三书。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四书”“五经”的注解之作多如牛毛，而这三种书之所以成为“四书五经大全”的蓝本，

- ① 陆心源也赞同此说。《仪顾堂续跋》卷二是书解題曰：“今勘之果然。惟此书小序次于每篇之后，《大全》则统冠全书耳。”（第222页）
- ② 朱彝尊进一步拓展其说，《经义考》卷四九《易》四十八《周易传义大全》解題有曰：“不知胡广诸人止就前儒之成编一加抄录，而去其名。如《诗》则取诸刘氏，《书》则取诸陈氏，《春秋》则取诸汪氏，《四书》则取诸倪氏，《礼》则于陈氏《集说》外增益吴氏之《纂言》，《易》则天台、鄞阳二董氏、双湖、云峰二胡氏，于诸书外全未寓目。所谓‘大全’乃至不全之书也。”（林庆彰等编著《点校补正》本，1997年，第二册，第343页）